



夏爾勒·貢斯當 與他的澳廣兩地記錄

許平*

18世紀下半葉，是包括法國人在內的歐洲人走近中國、認識中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也是他們的中國認識發生變化的時期。當時法國人走近中國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耶穌會傳教士在宮廷為中國皇帝服務，從政治和文化層面接觸中國⁽¹⁾；另一種是通過當時唯一對外開放的口岸——廣州、澳門兩地與中國直接通商，在實現物質利益的同時，從經濟和社會層面認識中國。這兩種不同的認識角度，產生了不盡相同的中國認識。這些認識對後來西方的中國印象變化產生重要的影響。

本文介紹一位名叫夏爾勒·德·貢斯當 (Charles de Constant) 的法國商人和他的中國記錄。夏爾勒在18世紀下半葉先後三次來澳門和廣州經商，第一次1779-1782年；第二次1783-1786年，第三次1789-1793年。他旅居澳門和廣州期間留下的大量記錄中國的手稿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²⁾ 他的中國記錄可以說是18世紀下半葉澳、廣兩地與歐洲聯繫的詳細資料，也是當時法國人對中國認識的歷史見證。

三次來華之旅

1778年9月，十六歲的夏爾勒剛從寄宿學校畢業，就與經營遠洋航海貿易的奧斯坦德公司 (La Compagnie d'Ostende) 簽約，成為“考尼茨王子” (Prince de Kaunitz) 號船的一名水手，計劃三個月後前往中國。為了給即將到來的中國之行做準備，這個外省青年除了在其伯父的介紹下出入巴黎社交界和各種沙龍外，還閱讀了伏爾泰描寫中國的書籍。這書是他母親送給父親的，書的編輯人是他外婆的兄弟，也就是他的舅公。此外，

他還閱讀了法國傳教士杜赫德 (P. Du Halde) 和瑞那 (L'abbé Raynal) 神父介紹中國的書籍。這些閱讀，使年輕好學的夏爾勒對遙遠的中國產生無限憧憬。這位出身名門、受過良好教育的法國貴族青年，帶着對中國的美好憧憬和種種疑問，帶着深入瞭解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強烈願望，在1779年來到了當時中國與西方聯繫最緊密的澳門和廣州。在這裡，也僅僅是在這裡，開始了他先後三次，為時十三年的中國經商之旅，同時開始了他幾乎持續一生的對中國的記錄與觀察。⁽³⁾

1779年2月，“考尼茨號”船終於啟航，年輕的夏爾勒開始了他的第一次中國之行。1779年9月22日抵達澳門海域，24日進入珠江，祇有十六歲半的夏爾勒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隨後，開始了他在廣州十三行的商業之旅。最初對異域的新奇很快過去，廣州的十三行長三百米，寬十多米，一到天黑柵欄門就關閉，歐洲人被禁錮在裡面，不能隨便出入。這樣狹小的空間實在容納不下一個少年對生活的渴求，好在冬天可以去澳門這個自由世界過冬，準備下一年的貿易。當時的夏爾勒年輕，沒有經驗，在商務事物中幾乎處

*許平，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

於無所事事的狀態，因而時間也就特別難以打發，1782年他決定回國。

如果說第一次為期三年的中國之行有甚麼收穫的話，那就是他學會了一點葡萄牙語和蹩腳的中國粵語，為未來更進一步認識中國開拓了新的途徑。對他後來的中國之旅更有意義的是，他在此期間認識了一位年長他六歲的波爾多人船長讓-依田那·巴蓋爾（Jean-Étienne Balguerie）。這個人正在編輯一份名為“對中國人的客觀評論”（*Remarques impartiales sur les Chinois*）的資料。他們經常在一起談話交流。受他的影響，夏爾勒不再祇滿足於從來到中國那天起就開始的記日記、寫家信，而是有意識地、盡可能地記下他所能記下的一切，包括海上運輸，市場狀況，出口貨物清單，具體商業運作等等。此外，他還記錄他所看到和聽到的關於中國、關於中國人的奇聞異事。

當他經過漫長的海上旅行，1782年1月在歐洲上岸的時候，已不再是當初那個對中國一無所知的懵懂少年。這位二十歲的青年人隨身攜帶着關於中國、關於澳門和廣州的珍貴資料。除了自己隨時記下的日記，還有一份1771-1779年由廣州離港的法國商船的裝貨清單，三十頁；一份關於增加對華貿易利潤的研究——〈關於對華貿易的簡要思考〉（*Réflexions succinctes sur le Commerce de la China*），二十頁；還有一份西方人在廣州貿易的使用手冊——〈論中歐貿易〉（*Mémoire sur le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avec les Chinois*），二十五頁。⁽⁴⁾

時隔一年，1783年1月23日，夏爾勒登上“齊岑多夫伯爵”（*Le Comte de Zinzendorf*）號船，再次踏上去中國的旅程。在海上航行的七個多月中，夏爾勒不僅抓緊時間學習補充商人必備的會計知識，而且分析整理自己搜集很久的有關中國的資料。他把這些資料分成三大類，“在華經商策略”（*Les instruments du commerce à la China*）、“商船貿易條件”（*Les conditions d'opération des vaisseaux*）和“在廣州銷售的貨物”（*Les marchandises à vendre à Canton*）。後來，他將這些資料合成為《論對華貿易》（*Mémoire sur le commerce de la China*）。⁽⁵⁾

是年8月23日，夏爾勒再次抵達澳門、廣州。這一回，年輕幹練的夏爾勒在貿易業務上也展開了拳腳。他為公司做的第一筆生意是從法國老領事那裡收購法國東印度公司房產租金的收益權。他所在的奧斯坦德公司業務發展很快，相繼派來中國五艘商船。夏爾勒把商船上的貨物賣給中國的商人，同時採辦中國貨物，超負荷地工作的同時，做一些自己的小生意，不亦樂乎。當年在澳門過冬的時候，他和朋友們弄了一條小船，到澳門周邊西南方向的島嶼遊玩。這些島由於偏僻，幾乎沒有中國政府的管束，他們可以在那裡自由出行。他在一個島上住了十五天，在不經意之間，接觸了不同於廣州的中國的鄉村世界，看到了中國這個龐大帝國雜亂無序的另外一面。

對於豐富他的中國認識更為有意義的是，1784年他認識了服務於北京朝廷、身居五品官職的法國耶穌會士梁棟材（Jean-Joseph de Grammont）。梁棟材在廣州休養的三個月時間裡，夏爾勒盡可能多地向他請教，聽他講述北京的生活、朝廷的故事和中國印象，並且把談話內容記錄下來，這無疑大大擴展了夏爾勒認識中國的維度。

1784年秋，中西之間出現一些外交摩擦。清廷逮捕一批西方傳教士，下令禁止傳教。11月，廣州發生“休斯女士商船事件”（*L'affaire de Lady Hughes*）。⁽⁶⁾是年底，清廷宣佈經澳門進入廣州的傳教士為非法。1786年年初，在廣州的夏爾勒有機會接觸了一些剛從中國牢獄中出來、被清廷驅逐的傳教士。一直想深入瞭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夏爾勒自然不會放過與之交談的機會。從他們那裡，夏爾勒聽到了與服務於清廷的耶穌會士梁棟材大相逕庭的對中國的描述。其中一個名叫聖·馬丁傳教士曾到過四川傳教，接觸過少數民族。他極力向夏爾勒說明，以往傳教士在西方宣傳的中國並非真實。夏爾勒在上百頁的筆記中記錄了這些談話。這些談話大大動搖了夏爾勒來中國之前源自耶穌會士和哲學家記述的中國印象。⁽⁷⁾

1786年初，夏爾勒登上了返回歐洲的商船。利用半年的旅途時間，他整理了第一次來華時的



割記，把它編成一本文學性的手冊，準備拿到歐洲沙龍上傳閱。同時，他把兩次在華的經商經驗編成一份以商品字母排序的目錄：《中國進出口商品細目》(*Détails sur les marchandises de China, exportation et importation*)，六十頁；還有一份《不同公司在華經商理念》(*Idées sur les différentes compagnies qui font le commerce à la China*)，四十二頁。另外，他還寫了一份關於“休斯女士號商船”事件的報告。⁽⁸⁾

6月，夏爾勒回到歐洲。這次在歐洲期間，在享受平靜而安逸的生活的同時，他把自己寫的遊記交給在日內瓦的朋友，希望他拿到沙龍上去傳閱。從此以後，夏爾勒被家人和周圍的人稱為“中國人”，時至現在，在網上搜索夏爾勒·貢斯當，還可以看到“Chinese Constant”的字樣跳出來。

1789年1月5日，法國大革命的前夜。夏爾勒登上了“王太子號”(Dauphin)商船，第三次踏上遠赴中國之旅。這一次，他是被法國東印度公司作為高級管理人員聘用的，年薪15,800英鎊。剛剛受聘，他就向公司提交了一份〈在澳門的暢銷商品〉(*Sur le bien qui pourrait résulter de la possession de Macao*)的報告，顯露了他在華經商的經驗和經商的才能。1789年9月20日，夏爾勒在澳門上岸。兩天後回到廣州。在廣州，他順利地組織中國貨物，發送貨船返航，重建法蘭西商館。1789年底，他成為管理廣州十三行法蘭西商館的大班。

正當夏爾勒躊躇滿志地投入新的工作，結交英國商館的負責人，甚至開始認真學習漢語和西班牙語，擴展自己的貿易聯繫的時候，一系列打擊接踵而至。1790年5月，他罹患敗血病，在死亡線上掙扎了一個多月。8月，好不容易逃脫死神的魔爪準備恢復工作，他又得知在1790年4月3日法國政府已經頒佈法令，取消東印度公司在華貿易的特權。這使得夏爾勒憂心忡忡，沮喪至極。好在公司又派來一艘商船，並很快裝滿中國貨物返航。這給了夏爾勒重拾信心的勇氣。他堅信對華貿易的前景無限。為了使法國當局收回成命，他

連夜趕寫一份〈論在廣州的公司貿易〉(*Mémoire sur le commerce des companies à Canton*)。1790年底附在給父親的信中，發給他認為能夠改變局面的內克(Necker)。殊不知此人這時候已經離開法國躲避革命的變幻風雲，此信自然石沉大海。

即便這樣，夏爾勒仍然沒有完全失去信心，也沒有停止他對中國的觀察。1791年2月回到澳門後，與一些英國朋友遊歷了澳門周邊的小島。通過與英國人的交往，他不僅知道從1786年以來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四分之三的對華貿易，而且他還更深地體會到，英國的海上霸權和政府的支持對英國的海外貿易意味着甚麼。這促使他從政治和外交的層面來思考法國對華貿易問題。他開始起草〈經濟與外交情報報告書〉(*Rapport de renseignement économique et diplomatique*)。這份報告總共12頁，夏爾勒托人轉交當時的法國海軍部部長。⁽⁹⁾

1792年11月，當夏爾勒因身體狀況的惡化和貿易前途渺茫而決定回歐洲的時候，他聽到了英國使臣嗎噶爾尼訪華使團已經啟航，正在途中，歐洲普遍關注中國的消息。夏爾勒大概覺得這是向歐洲介紹中國、強調對華貿易的絕好機會，於是，他乘此機會起草了〈1793年2月夏爾勒·德·貢斯當對嗎噶爾尼勳爵使華的一些想法〉(*Quelques idées sur l'Ambassade du Lord MacCartney par Charles de Constant Février 1793*)⁽¹⁰⁾，積自己十二年在中國之經驗，陳述對法國在華貿易和中國社會之論斷。遺憾的是，他對西方人對在華貿易準備不足，對中國文化不理解的提示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直到19世紀中葉，中國的大門被歐洲人用軍艦和槍炮強行打開，中歐之間交往的歷史步入了另一個階段。

1793年7月底，夏爾勒回到歐洲。此後，在一家銀行供職。結婚，生女，定居瑞士。但他一直沒有停止對中國的關注。1812年已經退休兩年的五十歲的夏爾勒甚至準備再次遠征中國，為此而搜集最新資訊，做了詳盡的財政預算和行動計劃。但是，畢竟時過境遷了，中國對歐洲貨物的



需求在減少，英國人控制着對華的鴉片貿易。夏爾勒終於明白，以往中法之間貿易的形勢已經不復存在，他的再次來中國經商之夢劃上了句號。

家族檔案

在日內瓦國家圖書館收藏着一份“貢斯當家族”的檔案，卷帙浩繁，佔據3米長的檔案架。這份檔案的最初編輯者就是夏爾勒·貢斯當和他的姐姐羅薩莉·德·貢斯當(Rosalie de Constant)。檔案覆蓋貢斯當家族上下幾代成員，但主要內容是這姐弟倆的。其中夏爾勒的就佔55%，這應該跟他自己整理檔案有關。夏爾勒生前就決定把這份家族檔案遺贈給日內瓦國家圖書館。此後，它被塵封在那裡，直到1860年才被打開。⁽¹¹⁾

夏爾勒·德·貢斯當出身於法國弗蘭德斯地區的一個古老貴族家庭。家族信奉新教。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時，1572年發生迫害新教徒的“聖巴特羅繆之夜”。此後，為尋求安全，貢斯當家族遷往日內瓦定居。貢斯當家族有兩種門風，一是法國貴族的從軍傳統，再有就是書香門第的讀書家傳。夏爾勒的曾祖父大衛·德·貢斯當(David de Constant)曾經四次擔任洛桑科學院院長一職，祖母出身醫生世家。夏爾勒的祖父撒母耳一世(Samuel I)先學習神學，後來從軍，官至將軍。他的父親撒母耳二世(Samuel II)也曾經是名軍人，提前退伍，潛心著述。夏爾勒的外祖父是著名的法學教授。母親早逝，夏爾勒由外婆帶大。十三歲半時夏爾勒被父親送到英國的一所寄宿學校學習。在這裡，他學習英語、數學、物理、天文、地理等知識，為日後生涯打下了基礎。

貢斯當家族社交廣泛。從檔案中保存的與其家族成員有書信聯繫的人來看，二十多位是法國和瑞士的貴族，更多的是遍佈法國和歐洲的名流雅士——思想家、人文學者、作家和科學家等。其中最著名的有伏爾泰、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和斯塔爾夫人(Germaine de Staël)。⁽¹²⁾貢斯當家族本身也出了一位可以與這些人齊名的人物——本傑

明·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他是夏爾勒伯父的兒子，法國啟蒙時代和大革命前後非常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¹³⁾從檔案保存的信件來看，

“貢斯當家族的通信網絡，構築了一個虛擬的沙龍(沙龍的成員通過書信的方式進行交流)，這個沙龍的成員幾乎囊括當時大半的大資產階級。這樣的社會構成與愛爾維修(salon d'Helvétius)的沙龍更為接近，而不像普魯士宮廷的沙龍。這些與貢斯當家族保持書信往來的人，代表了一個以歐洲啟蒙運動為中心的，開明而自由的法語世界的智識階層。它的成員遍及歐洲，涵蓋從倫敦到莫斯科，從哥本哈根到都靈的廣大地區。但是，當歐洲那些由他們醞釀的革命風起雲湧之際，他們卻走向衰落，‘哲學’為‘浪漫主義’所取代。當歐洲的啟蒙運動式微的時候，貢斯當家族成員對文人的興趣大於人文學者的興趣，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與文人的通信，他們與伏爾泰的通信，多於與百科全書派的通信。”⁽¹⁴⁾夏爾勒的姐姐羅薩莉就和很多有名的作家、政治家、科學家和社會名流保持經常的通信聯繫。

前面已經敘述，受時代和家庭的影響，夏爾勒從踏上澳門和廣州這片土地那天起，就開始以日記、通信和撰寫文章的方式記錄中國，觀察中國。十三年間，他經歷了商海中的暗礁和險灘，承受過貴族封號被法國革命褫奪，法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特權被國民公會取消，貿易受阻等打擊。但是，他對中國的記錄、觀察和思考從來沒有停止。1793年最終回到法國後，夏爾勒對中國的興趣依舊。他利用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接觸的機會搜集關於中國的資料。1809年，他的兩本關於中國的撰述《對華貿易須知》和《中國論》幾近完工。後來又在姐姐羅薩莉的幫助下，將自己的資料進行分類整理。在去世前三年的1832年，夏爾勒在日內瓦《健談家》(Causeur)雜誌發表了描述廣州到澳門風土人情的文章。雖然這是他生前唯一發表的關於中國的文章，但在他留下的15,000頁的檔案資料中，有2,200多頁是關於中國的文字。⁽¹⁵⁾

夏爾勒·貢斯當關於中國的記錄全部來自澳門和廣州。其中包括：1) 在澳門和廣州寫給家人的信件和日記，佔中國資料的13%；2) 關於中國的其它資料，包括讀書筆記、貿易清單和類似民族志類的資料。這類東西佔中國資料的55%；3) 研究綜述，包括非貿易類的資料，四份〈在華貿易須知〉和五篇〈中國論〉論文，還有一些討論貿易的論文，佔中國檔案的32%。⁽¹⁶⁾ 其中包含1792年11月，他即將離開中國之前，聽說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即將來華，歐洲社會對中國空前關注的時候，趕寫的從人類學的角度論述對華貿易和中國社會的文章〈1793年2月夏爾勒·德·貢斯當對馬戛爾尼勳爵使華的一些想法〉(Quelques idées sur l'Ambassade du Lord MacCartney par Charles de Constant, Février 1793)。⁽¹⁷⁾ 除了日內瓦圖書館的那部分中國檔案外，還有部分收稿真跡保存在其後人手裡。他的一個後代菲利浦·里耶(Philippe Rilliet)手裡就有一份七十八頁的手稿，題為“夏爾勒·德·貢斯當致瑞士親友的信，1789-1793：接續赴華後中斷之日記，對中國風俗習慣、法律、手工製品貿易之見聞觀察”(Lettres de Ch. De Constant à ses parents en Suisse Servant de suite à son journal interrompu à la Chine, rendant compte de ce qu'il apprend voit et observe, des mœurs, coutumes, lois des Chinois, des productions manufacturées, commerce etc. du pays, 1789 à 1793)⁽¹⁸⁾

受啟蒙時代的沙龍文風影響，夏爾勒用書信和日記的形式記錄、傳達了對中國的最初印象後，盡力系統地編輯自己的記載，在此基礎上試圖寫出對於中國的總體觀察文章，完成了一部對中國的文化諮詢著作。這種主要依賴主觀印象，同時說明事情道理的文風顯然很適合啟蒙時代的語境，特別適合在高談闊論的沙龍中演講和傳閱。但是，正是由於他過於在意沙龍的反應，有意取悅沙龍⁽¹⁹⁾，才使得他為其所累，不能像後來他的同胞托克維爾那樣，寫出《論美國的民主》那樣使之聲名遠播而又影響深遠的著作。這裡，我們不能不感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資料價值

有人說，夏爾勒·貢斯當原本應該有更大的聲望，祇是由於其堂兄本傑明·貢斯當的名聲太顯赫，他反倒被埋沒了。⁽²⁰⁾ 19世紀以來，國內外學界對本傑明·貢斯當的研究不斷，而且持續昇溫。在其家鄉洛桑大學就設立了專門的“貢斯當研究所”。近年來，我國學界也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對本傑明·貢斯當的學術關注，不僅翻譯出版他的著作，而且有一些專門研究的學術論文發表，在法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過程中來解讀那一位思想家貢斯當。但是，國內學界對這一位“‘Chinese’貢斯當”的研究確是一片空白。筆者祇見耿昇先生在〈17-18世紀西方人視野中的澳門與廣州〉一文中提到了他家族以及他的著述所藏之地。⁽²¹⁾ 也正是這一筆介紹，使得正苦苦搜尋的筆者眼前一亮，激發了對夏爾勒·貢斯當的研究興趣。隨着材料挖掘的逐漸深入，筆者對他的學術興趣日益增長。因為看到夏爾勒·貢斯當留下的東西，是研究18世紀澳門與法國之間文化聯繫和商業往來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

夏爾勒·德·貢斯當的中國記錄之所以珍貴，原因有以下幾點：

夏爾勒的中國記錄發生在18世紀下半葉，這時正是中國和歐洲交往、彼此認知的一個特殊時期。中國在變化，歐洲正在發生變化，中國和歐洲之間的歷史平衡也即將發生變化。從地理大發現開始，歐洲人帶着對異域的嚮往走向世界。歐洲人在進行經濟擴張和文化浸潤的同時，以不同以往的眼光觀察、記錄並研究他們所遭遇的不同文明。無論是對南美野蠻人的描述、對大西洋塔西提島土著人的讚美，還是對非洲人與阿拉伯世界的解讀都是如此。對中國這一古老的文明古國，他們從馬可·波羅開啟的對中國的崇拜，發展到對亞洲開明君主的仰慕和對中國文化的追崇。眾所周知，以伏爾泰、萊布尼茨為代表的歐洲啟蒙運動思想家是借助對中國文化的熱情追捧

而對歐洲文明進行徹底的批判，從而實現現代法國和現代歐洲的破繭成蝶的。但是，恰恰是這場18世紀上半葉興盛於法國的啟蒙運動為歐洲的中國認識，也為歐洲後來的世界觀念提供了二元對立的進步與落後、野蠻與文明的價值尺度。這一尺度是由當時正在發生的，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範圍內的歷史進步和歷史停滯造成的。18世紀下半葉，正值這種正在發生和即將發生的歷史進步與歷史停滯的當口，也是歐洲的中國認識轉變的時候。因而，夏爾勒·德·貢斯當的中國記錄就具有特別的歷史意義。

以往的中國記錄多出自傳教士之手，其解讀也就多停留在文化與政治的層面上。夏爾勒以一個商人的身份，居住當時唯一對外貿開放的口岸廣州與澳門十幾年。錙銖必較的商人眼光和身處其境的社會磨合，使得他的觀察集中在經濟與社會層面。與當時服務於朝廷的法國很多知名傳教士的流傳甚廣的鴻篇巨制比較起來，他的記錄更少理想化的色彩，更多實際的觀察，當然也缺少後者的宏觀把握和精髓提煉。由於家庭書香文化的薰陶，夏爾勒是個具有社會學、甚至人類學眼光的商人。他的記錄是多方位的，遠遠超出經濟領域，因而也就具有特別的研究價值。

夏爾勒中國記錄的獨特性還在於，記錄本身全部來自廣州和澳門兩地，帶有明顯的地域性。因而是我們理解18世紀澳、廣兩地與法國、與歐洲、與世界聯繫的特別難得的歷史資料。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中國記錄中還包含了在清廷當官的法國傳教士的感受，也記載了被清廷羈押驅逐的傳教士的講述。這使得他的中國記錄不僅在地域上延伸至北京、至內地，而且在觀察角度上容納廣闊。澳、廣兩地的身臨其境的記載和來自京城內地的道聽塗說，還有夏爾勒個人的理性分析和專題撰述，都豐富了這份中國記錄。

迄今為止，包括法國和瑞士在內的國外學界對夏爾勒·貢斯當的研究不多。就筆者所知，祇有兩部關於他的編著出版。一部是巴黎東方語言學院的瑪麗-瑟比耶·德·維耶娜整理的

《啟蒙式微時代的中國：廣州十三行法國商館商人夏爾勒·德·貢斯當的中國經歷》(Marie-Sybille de Vienne, *La Chine au déclin des Lumières: L'expérience de Charles de Constant, négociant des loges de Canton*, Honoré Champion Editeur 2004)，還有一部是路易·德米尼先生(Louis Dermigny)編輯的《夏爾勒·德·貢斯當論對華貿易》(*Les Mémoires de Charles de Constant sur le commerce à la Chine*, Paris: S. E. V. P. E. N. 1964)。這兩部書都含有編著者對夏爾勒·貢斯當具有開先河意義的研究體會，但書中的主要內容是夏爾勒有關澳門、廣州和中國的日記、書信和商業記錄和文字輯錄。因此，兩部書最主要的學術意義在於，為後來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貴的第一手材料。

【註】

- (1) 法國的耶穌會士與其它耶穌會士不同，他們的主要成員從路易十四時代開始進入中國宮廷，而不是在民間傳教。
- (2) (11) (12) Marie-Sybille de Vienne: *La Chine au déclin des Lumières: L'expérience de Charles de Constant, négociant des loges de Canton*. (《啟蒙式微時代的中國：廣州十三行法國商館商人夏爾勒·德·貢斯當的中國經歷》), Paris: Honoré Champion Éditeur 2004. p. 7; p. 32; p. 24, p. 35, p. 37.
- (3) 夏爾勒·貢斯當先後三次來華。但是他祇到過澳門和廣州兩地。夏天在廣州十三行經營，冬天到澳門休息半年。他的全部中國觀察來自澳廣兩地。
- (4) (5) (7) (8) (9) (10) (14) (15) (16) (17) (18) Marie-Sybille de Vienne, p. 54; p. 56; p. 62; p. 65; p. 74.; p. 79; p. 28; p. 87; p. 107; p. 79; p. 103.
- (6) 1784年10月發生的中英商船衝突。英船鳴炮打死了中國人。中國官府逮捕英船長史密斯，此事幾乎釀成中歐商船之間的一場武力衝突。
- (13) 本傑明·貢斯當(1767-1830)，是法國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著有《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立憲政治教程》。強調個人的自由至高無上，主張君主立憲政體。在法國革命時期，是拿破崙的反對派，1830年曾任立法委員會主席。
- (19) 夏爾勒幾乎沒有私密的個人信件，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的日記和通信主要是描述自己的中國經歷，傳達對中國的觀察。即使是“在華貿易須知”、“中國論”這樣的綜述文章，也是以信函的形式表達。
- (20) (21) 耿昇：〈17-19世紀西方人視野中的澳門與廣州〉，載耿昇、吳志良主編：《16-18世紀中西關係與澳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8；頁8-9。